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整理与存留

■杨红伟 李文平

史料作为承载历史信息的媒介,具有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非物质形态史料作为当代史料重要组成部分,随信息技术更迭而生,尤为关注社会微观层面变迁所蕴含的历史意义。在生成方式上,非物质形态史料突破了史料须由专业人员完成的局限,形成记录主体多元、记录内容广泛、记录类型丰富的特点。在整理与存留过程中,非物质形态史料将数据库建设作为关键的节点,积极介入知识领域内多层面的分析与处理,使原本零散、独立的数据产生互动与整合,以实现知识的流动与增值。此种“自下而上”的史料存留体系,所体现的不仅仅是信息传递顺序的转变,更是新的史学观念和态度。

[关键词]媒介;非物质形态史料;史料存留体系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25)06-0005-14

[基金项目]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委托项目“《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汇编·甘肃卷》”(2023ZDWT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创世神话的流变与传播研究”(20CZW058)、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甘肃少数民族口述档案研究”(20YB017)

杨红伟,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兰州 730020)青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海西宁 810000)

李文平,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甘肃兰州 730020)凉州文化研究院兼职青年研究员。(甘肃武威 733000)

媒介的物质形态差异,必然导致史学研究思路的不同。以“媒介考古”为例,此种研究旨在挖掘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却转瞬即逝、无法存留的媒介物。其问题意识在于,注意到典范媒介记录信息的局限性,以期通过探寻被忽略、被遮蔽的另类媒介,关注到历史的可能性与丰富性。进而复原穿行于普通社会生活的信息流,完整地刻画出历史本相。因此,借当代媒介更迭之由,以非物质形态史料作为观照对象,探寻被遗忘、被删除的历史碎片,拓宽新史料研究空间,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传统史学范式下生成的历史资料,多以官方和精英视角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叙事,较为关注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和关键因素,并以此为纽带,同历史学科建构形成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支撑传统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作用,故19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特别强调史料乃历史研究的唯一依据。随着现当代社会信息交替活动的骤增,固有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模式已不能很好地反映社会全貌,众多社会新问题产生的资料被隔离在历史研究领域之外,导致史学研究需求与现有史学资料无法对等,凸显了传统史料内容覆盖面狭小、无法满足现当代历史研究需求的一面。

史料产生于特定的“场”。在“场”被明确视为具有基本的物质形态前,实物被认为是物质存在的唯一形态。受此认识论影响的史学研究范式,不可避免地聚焦于物质性史料之上。这种以自然界中分立的聚集状态存在的物质性史料,其展现形态、生成路径,乃至记述效果均依赖于各时期物质性媒介的发展水平。从最初的结绳记事、器皿图画、青铜铭文,到此布帛、简牍、纸张等,物质形态史料的记录方式不断丰富,信息承载量亦不断增加,与社会发展形成良好互动关系。由敦煌清水沟出土的汉代“历书木简”,到莫高窟问世的“敦煌遗书”,可以清晰看到在同一地理空间范围内,伴随媒介形态的变化,文本书写的内容也在不断扩展、延伸。回顾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每一次文明质的飞跃,均与媒介革新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即哈罗德·伊尼斯所言,“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P28)}。时至当代,人的认知需求日渐提升,历史学家更是迫切希望能够拓宽史料来源,真实、完整地当下历史进程留下详细的记录。由此,多媒体叙事方式得以广泛而细致地介入历史记忆保存活动,将体现社会发展意义的各项构件或要素保存下来,并促成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体系的诞生。

关于非物质形态史料的国际前沿讨论,主要集中在创新研究方法与数据库建设方面。倡导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研究者认为,当前的史学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缺陷,无法体现出历史中被抹去、去语境化和被扭曲的情形。^[2]他们强调,应将视野投向曾经被忽视的角落,如运用口述史研究法记录、分析创伤性事件,特别是一些公共性伤害事件(自然灾害、战争、瘟疫、屠杀、恐怖活动等),并在不考虑明确的语言内容的情况下将非语言信号呈现为新颖的表征,为探索、开辟新的口述历史档案提供可能性。^{[3](P2)}数据库建设,提倡扎根于理论框架的问题分析,将“伦理、许可和控制”“可访问性和参与性”“宣传和意识”和“创新技术”视为重要检取主题,把抄本(transcript)、关键词(keywords)和诠释性数据(metadata)视为数据库建设最重要的三类信息。^[4]他们强调,把社会信号处理应用于口述历史档案分析,比仅作口述历史的记录与分析,将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为从广泛的访谈集中观察人类的情感和躯体反应,将使来自多个领域的学者,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关注这些访谈中表达的感受、情绪、文化和主观体验。^[5]

国内非物质形态史料研究起步较晚,相较于口述史,对于影像、仪式、空间、传说、数字新闻以及微博、论坛、短视频等内容中存留的史料关注度较低,尚未形成有效的系统化研究格局。因而,以口述史为例(基于1993—2022年CNKI收录文献),采用CiteSpace生成可视化口述史知识图谱,可呈现出当前国内非物质形态史料研究前沿、研究主体、研究热点等。其中关键词数据显示,国内口述史研究视野宽广,涉及历史学、人类学、档案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方面;早期侧重口述史学、口述档案、研究方法讨论,2000年后延伸至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史、地方志等;近10年

研究走进集体记忆、图书馆、三线建设等研究。基本趋势如表1所示。

表1 口述史关键词数据表

关键词	口述史	口述历史	口述史学	口述史料	传承人	口述档案	图书馆	口述资料	川剧	传承	集体记忆	……	人类学	史学界	社会史	妇女史	历史学
频次	435	129	42	42	27	22	16	14	13	13	11	……	6	6	6	6	6
中介中心性	1.03	0.32	0.1	0.07	0.03	0.03	0.02	0.05	0.02	0.01	0.05	……	0.02	0.01	0.01	0	0.01
年份	1993	1998	1993	1993	2008	1993	2012	1998	2014	2012	2017	……	2003	1999	2006	1999	2005

网络分析中,常用中介中心性或称介数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测量网络中节点(tipping points)体现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即一个节点愈是处在其他节点间的多条最短路径上,其介数中心性就愈高,在网络中的作用和影响力就愈大,亦可由此控制信息的流动。根据表1可见,“口述史”作为不同学科网络中的支点,虽与多个学科存在关联性,但差异性极为明显:其中口述史、口述历史、口述史学的中介中心性数值较高,多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人类学、史学界、社会史、妇女史、历史学、川剧、传承等的中介中心性数值较低,多出现于2000年之后。后一类型与“口述史”的紧密度较低,说明两者的价值联系发掘工作开展较晚。

国内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肯定非物质形态史料价值,认为传统文献档案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与政治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记录较少,缺少个案记录,应彻底摆脱传统史学精英历史观,透过各种边缘的、被忽略的“历史记忆”,了解“历史”本质及其形成过程,重新创造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6](P5)[7](P141)[8](P77)}这类研究强调非物质形态史料涉及社会各个阶层,研究价值不再单纯囿于弥补文献史料不足,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可为社会弱势阶层提供表达生存和文化权益诉求的途径,深层次唤醒他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9](P168)[10](P70)}二是肯定科学技术对非物质形态史料的促进作用,认为技术发展促成档案载体和形式的巨大变化,催生出新的档案术语,产生了包括“口述档案”在内的各种新型档案材料。^{[11](P6)}这类研究强调借助信息技术及大数据分析技术,对口述史料进行对比与考证,整理和撰写出符合规范的史料。^{[12][13](P151)}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产生得益于媒介更迭与理念革新,对于在细微处把握历史发展脉络,重现社会集体记忆,提供了独特的素材。当前,国内外研究主要关注于完善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研究方法,阐述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研究价值,以及建构非物质形态史料与数据库间的多重关联。

二、非物质形态史料概念界定

传统史料并无形态划分,以媒介形态为标准,重新划分史料,是基于媒介更迭衍生出的新史观,即主张拓宽记录方式,利用“典范媒介”及“另类媒介”去反映、呈现被忽视、被隐藏的历史细节。非物质形态史料所关注的对象,既包括过往的历史,也包括正在发生的历史。

(一)非物质形态史料概念

在“场”中,信息是否均以“实物”存留,换言之,“物质性媒介”是否为史料的唯一形式?很明显,即便可以确定“场”具有物质的基本形态,“场”中的信息流也不可能全部以“实物”形式呈现、传递与保存。“非物质性媒介”的存在,决定了在物质形态史料之外,必然存在非物质形态史料。

与物质形态史料基于物质性媒介而生不同的是,非物质形态史料泛指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外在于物质存在形式的一切精神、行为与语言产品。如未被物质性媒介记录过的,能够反映古代社会生活的史诗、仪式、思想观念、语言词汇等,以及能够呈现当代社会发展历程的数字新闻、电子邮件、社交平台记录、网站公告等。这些作为传播对象的材料,非物质性体现在“认为传播是建立在人类认知、思想、语言和象征等基础之上的”^{[14](P71)},与之相对的物质性则“指向物理性,并与基础设施、空间、技术、身体等问题联系在一起”^{[14](P71)},形成既相互有别,又和合共生的整体。故而非物质形态史料,是借助物质性媒介存在的非物质性材料。

非物质形态史料产生时不具备任何物质性外壳,只能依托物质性媒介完成形态转化,进而实现长期存留的目的。一是古代“非物质形态史料”的转化,即与古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却未被政府或个人以物质性媒介记录过的史诗、说唱、仪式、民歌、思想观念、语言词汇、工艺流程等,它们多依“非物质性媒介”传播,存在稳定性低等客观问题,由此造成自身逐步缩小为特定群体或空间内的知识传递对象。二是当代“非物质形态史料”的转化,即与当代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却处于传统史料存留体系之外的影像存留、数字新闻、电子邮件、社交平台记录、短视频、网站公告等,这些实效性极强的数字信息,因“非物质性媒介”传播特性,极易湮灭于当代难以计数的信息流中。因此,媒介形态转化就成为非物质形态史料生产的关键步骤。相较于传统媒介难以记载此类史料,信息技术深度革新下促成的物质形态“新媒介”,能够以视频、音频、电子文档、数据库等形式对其进行存留,从而完成“非物质形态史料”的形态转化过程。

非物质形态史料概念的提出,出发点是扩大史料生成范围,将更多材料纳入史料数据库,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提供保障。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非物质性媒介承载的材料都可以定义为非物质形态史料。从狭义范围讲,只有那些能够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神、行为与语言产品,才能归类于此。因此在确定哪些材料可以成为非物质形态史料时,历史工作者要避免概念的扩大化倾向。一是要利用新媒介优势扩大整理与存留范围,对能够反映古代社会生活和当前历史进程的,尚未纳入史料留存体系的各类、各层面非物质形态史料进行整理与存留。二是要遵循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制度要求,在尽可能纳入更多材料的前提下,以客观性为中心,依据行业固定标准进行适度甄选,排除不具备任何研究价值的非物质形态材料。

(二)非物质形态史料特征

媒介对历史发展的推进从未停歇,“媒介的形态对社会形态、社会心理都产生深重的影响”^{[1](《译者序言》,Px)},“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1](P28)}。与传统物质形态史料不同,非物质形态史料初次产生时便不具备物质形态,其生成与传播更多是基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求。因此从生成过程来看,非物质形态史料具有形态特殊、视角多元、干扰较少、双向传播等鲜明特征。

其一,形态特殊。非物质形态史料自身并不具备物质外壳,其记录与呈现只能借助物质性媒介,传播方式与传播路径亦具有一定独特性,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物质形态史料记录对象的固定,非物质形态史料的记录对象包含社会全体成员,形成记录内容广泛、记录主体多元、记录视野独特的特点,突破了传统史料生成须由专业人员完成的局限。特别是随着承载非物质形态史料的媒介类型不断更迭,展现途径呈现出集视、图、音为一体的综合形式,为史料生成理念转向提供了可能。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特殊性及其功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方面有着突出体现。如裕固族由于本民族文字失传,历史与集体记忆主要通过口述活动完成,《沙特》《黄黛琛》便是代表

作品。《沙特》作为裕固族创世神话史诗,除主体文化外,糅合进了亚洲内陆诸多游牧地的宗教、神话和历史文化元素,展现了裕固族在多民族环境下融合演变的历史脉络。《黄黛琛》是裕固族内广为流传的叙事作品,以散韵结合、边说边唱的方法,表现出裕固族文学作品独特的悲剧意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两者均处于遗失边缘。新媒介的出现,以较低成本的方式扭转了它们即将遗失的危局。2022年,甘肃省肃南县文化馆以视频录制形式,将流传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明海一带的《黄黛琛》作品,经由说唱艺人钟玉梅(璁尔姬斯)表演后进行收录,并进行线上展示,保护、宣传成效显著。

其二,视角多元。古代社会由于人类记录视角缺陷及媒介稀缺等因素,广泛而全面地记录社会生活全貌将是一件无法完成的工作。因此,当时历史记录者们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和阶级立场,都只能依据自身知识体系所形成的认知视角,选择较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予以记录。此种生成模式不但限制了记录主体视角的多元化发展趋势,也制约了记录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新媒介的产生,使之能够突破单一媒介对于史料记录的限制,开拓出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如当前影视人类学的蓬勃兴起,便与媒介革新密不可分。在调查过程中,记录者开始摆脱束缚,从镜头前的精心安排走向田野,以观察者身份走进人群,去参与、接触、观察、发现、感知研究主体的现实生活。

哈罗德·伊尼斯认为,媒介的演变可引发意识形态与思想的变革。^{[1](P1-26)}此观点亦可用来审视新媒介对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的推动作用。中国传统史料以官方记录为主导,这源于政府的治理需求与阶级话语权的掌控,也是古代社会信息传播水平低下、信息载体单一的结果。近代以来,书籍报章刊印方式革新,成本降低,普通知识分子亦可由此刊布见闻、发表见解,无形中使政府从记录历史的主导者,转变为历史叙事的参与者,并接受舆论的监督。及至当代,在新媒介的推动下,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更是突破了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观念限制,使“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人皆是记录者”成为可能。如面对热点事件,当事人的口述、目击者拍摄的视频、媒体工作者的报道、政府的数字平台公告等,形成了围绕事件本体的多元叙述,弥补了传统史料记录视角单一的缺陷。

其三,干扰较少。史料的生成与传播,存在着“噪声”及“把关人”对于史料真实度的影响。在传播学中,“噪声”意味着信息传播并非处于封闭环境之中,因内外多种因素的干扰将使之产生不同程度的衰减和失真,即“在转换和接收中附加于信号的非信源所愿的任何东西”^{[15](P7)}。传统史料多由官方或知识精英编撰完成,质量相对较高,但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自身素养、价值判断、专业技能差异、抄写过程疏失等原因,都有可能形成“噪声”。这将对原信息产生干扰,使史料出现失真现象。以价值判断为例,中国历代王朝向有为前朝修史的惯例,借此申明正统,总结治乱兴衰。但在具体编纂工作中,因两者政治利益相左,诸多历史事实在“噪声”干扰之下,往往呈现出远离真相的一面。

“把关人”即某些组织或个人,依据自身需求,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只有符合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进入信息传播过程。传统史料的生成环节,也存在类似“把关人”的主观性选择。这种情况常源于官方政治需求与个体认知差异,是通过行使筛选原材料的权利,完成符合自身阶层利益的历史建构活动。北魏时期,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领銜续修国史。崔浩总裁的《国记》因秉笔直书拓跋氏早期的历史,被鲜卑贵族目为有意“暴扬国恶”,遭到诛杀。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也遭到株连,北方士族遭受沉重打击,史称“国史之狱”。这就使原本用来记录历史过程的历史书写,在统治者和史官的共谋下,变成深受主观态度影响的重构活动。当代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因其记录主体的多元性、途径的广泛性,能有效排除外在干扰,扭转此种书

写的偏差。

其四,双向传播。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不仅为知识传递提供了多种有效途径,也为处理信息单向传播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原本由上而下的单线记录模式,逐渐转为互为补充的复线记录。这就丰富了史料内容,拓宽了史料来源,将碎片化的社会信息黏合于完整的历史叙事之中。用世俗的方式记录、表现普通人在历史变革之中的思想历程,既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产物,也秉承了传统历史研究中的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思想特点。在新媒介推动下,史料传播的双向循环过程得以实现,受众能够将接收到的信息再次通过媒介互动、反馈给传播者,进而影响新的史料生成过程。史料生成活动不再局限于固定阶层的叙述,普通民众亦可凭借便利的媒介成为新历史的记录者。至此,非物质形态史料记录者,开始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史料的传播者,又是史料的受众。

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的双向传播过程可分为各种信源——译码者\释码者\编码者——大量同一信息——不同受众——反馈码者\释码者\编码者等多个维度,相较于传统物质形态史料生成、传播的机械体系,具有大众传播模式的特征。这使主体能够独立承担译码者\释码者\编码者三种不同角色,并借助媒介将依据信源生成的各类史料,复制、粘贴给更多的受众。受众则可作为新的反馈码者\释码者\编码者,将重新解释或加工后的史料信息在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反馈和传递,形成人际间更广泛的互动与联系。

三、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

随着媒介更迭推动,历史学家探究真相的视角开始转变,不再局限于单纯的官方叙述或文化精英记录,而是将挖掘散存于社会活动中的个人记忆或集体记忆作为工作要点,力求获得更为完整、多元和具象化的认识。这使得非传统史料研究工作走向台前,促成史料生成理念转向。

(一)思想与技术的耦合推动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

技术变革的背后往往是思想驱动,非物质形态史料的诞生,归根结底为人的需求与技术发展之间产生了耦合。社会发展催生出新的史学观念,促成传统史料生成理念转向。历史研究者也迫切希望新技术能为史学研究深层次化提供支撑,为新观念的实践提供可能性。两者合力推动史学研究趋势逐渐变化。作为行为主体,人的参与使社会活动具有意义,并使之体现出人的意识。非物质形态史料的产生,正是人的主体性“觉醒”导致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体现出历史学家在多元社会格局下,希望突破传统史学研究局限,全面掌握历史材料,拓展研究边界的目标性追求。

以数字人文为例,从形式、内涵看,其是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双向融合之结果,是一场跨学科融合和创新性学术的对话,促成了物质形态史料研究范式的革新,推动了非物质形态史料研究的深化。从早期人文计算(Humanities Computing)探索到当代数字人文实践,概念的更迭所体现的正是技术对于研究理念的深刻影响。开放性、协同性、实验性和多样化特征使之具有促进知识创新与知识服务的价值与效用。^{[16](P2)}数字人文视域下的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不止单一的信息采集,更具有文本挖掘、图像分析、数字重建、知识图谱构建等多种功能。^{[17](P12)}在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方面,研究者多以历史主义为核心,通过构建概念模型,在历史主义框架下进行逻辑主义整理与开发,开展档案数据深度处理,并在逻辑主义基础上进行历史主义整理与开发,实现历史关联可视化。^{[18](P17)}

信息化背景下的史料生成活动,在需求与技术耦合合力下,通过将不同形态的研究对象数字化,保障和满足了当代史学研究对于多元史料的需求。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与传统史料生成范式存有较大差异,导致其整理与存留也呈现出新的态势。

(二)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路径与形态转化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特殊之处在于其与物质性媒介之间的密切关系,指明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路径,阐述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过程中的形态转化,既可以直观呈现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的实践方案,也可以有效区分非物质形态史料与物质形态史料之间的不同。

其一,生成路径。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基于媒介革新,“纵观媒介的发展史,无数的技术和技巧被开发出来使瞬间永存”^{[19](P144)},新媒介的出现使原本无法被记录的史料重新进入研究者视野。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对象包含两类,一类是过去没有被记录的历史,一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第一类史料以未被政府或个人以物质性媒介记录过的史诗、说唱、仪式、民歌、思想观念、语言词汇、工艺流程等为主,它们的传播过程大多依靠口耳相传。第二类史料以处于传统史料存留体系之外的影像存留、数字新闻、电子邮件、社交平台记录、短视频、网站公告等为主,它们的传播过程具有较强的数字化特征。两者虽有所不同,但核心要素未变,即在转化为非物质形态史料之前均依靠“非物质性媒介”存在。因此,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有以下要点。

首先,确定生成对象。以过去或当前没有被记录的历史为例,研究者须选择具有历史研究价值,且未被政府或个人以物质性媒介记录、完整记录过的材料作为生成对象。在古代“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方面,研究者要在确认研究对象具有历史价值后,借助新媒介完成科学化记录,为后续生成做好奠基工作。如记录作为历史材料的濒危语言不仅能呈现域内族群交融痕迹,还可由此判断使用某种语言的人群的来源和形成问题。兰州大学科研团队便在西北民族地区濒危和接触语言研究中,借助新媒介记录有28万条语音数据、1900小时影像数据,并将其与43种语言的语法矩阵共同保存在数据库中展开研究。在现代“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方面,研究人员要将注意力放在具有研究价值且未被纳入传统史料存留体系的材料上。如当代政治人物在社交平台上的发言便不可忽视,对其系统记录与整理,能够呈现其政治主张和认知轨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政策或观点,虽以非常规的方式加以出现,但因与美国国家政策具有极高关联性,亦被一些学者视为可以存留的非物质形态史料。

其次,选择恰当媒介。如果说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是对传统史料生成体系的补充和扩展,是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对非物质形态材料的迁移和复现,那么选择何种媒介实现这种迁移和复现就显至为关键。如对于传统非遗产品制作而言,选取能留存影像的媒介最为恰当,这样不但能够完整复现生产过程,还能记录与之相关的所有生产要素。此外,对于反映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信息,也应选取恰当媒介将其存留,以期为经济史研究提供直接材料。如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达10%,此种以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模式实现快速优化资源配置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数据,而传统媒介的信息容量已很难将其完整记录。故而选取稳定性高,且信息容量大的硬盘、数据库,才能满足整理与存留的需求。

其二,形态转化。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特点之一是非物质性,即作为不具备物质性外壳的史料,非物质形态史料的生成须经过从非物质形态到物质形态的转化过程。如未被物质性媒介记录过的史诗、思想观念、影像存留、数字新闻等非物质性材料,因不具备任何物质性外壳,在传播时面临长久性与稳定性困境。这就导致随着时间推移,其所携带的信息极有可能逐渐消解。因此,若要将这类材料生成为稳定的史料,就得寻找恰当的物质性媒介,并将这些原本寄于“非物质性媒介”上的信息转载于物质性材料之上。

值得关注的是,非物质形态史料在初生之时即以非物质形态呈现,生成之后却又与物质形态

史料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因此,在判断何为非物质形态史料时,重点并不在于它的生成、整理与存留过程是否与物质产生了关联,而是要了解其最初为何种形态。也就是说,非物质形态史料并非与物质性泾渭分明,作为非物质材料存在,其借助物质性媒介完成了自身的再现与存留。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史料虽被归类为非物质形态史料,自身却又存有物质性要素。例如,戏曲和传统技艺这些广义上的史料,本身就是互嵌式地存有非物质性和物质性。戏曲的唱词、配乐、舞台动作属于非物质形态,舞台、服饰、乐器等又属于物质形态,它们在同一空间内凝聚,共同构成一次完整的展现。再如工艺流程,工匠自身的技艺传承、创作构思,属于非物质形态,使用的各类工具却又具有物质性。如此便极易混淆两者之间的边界,难以对其准确归类。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并不是存在物质性要素就是物质形态史料,此类互嵌式材料,如果整体上呈现出更多的非物质性特征,那就应该将其纳入其中。

综合比较可知,非物质形态史料与物质形态史料同在“场”中产生,应在历史研究中具有同样基础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作用。甚或,非物质形态史料相对于物质形态史料具有更加鲜活性、生动性与直观性的特点,将其纳入历史研究,并不仅仅是具有拓宽史料来源、丰富史料类型的意义。

(三)非物质形态史料的优势

非物质形态史料研究产生于信息化背景之下,使原本无法完成的海量信息记录工作成为可能。此种记录方式具有广泛性,真正跨越了阶层限制和认知局限,最大程度地呈现了历史真相。

一是内容更加丰富。传统史料受媒介所限,大规模编纂历史文本只能是官方行为,个人则极难获得全面、丰富的数据资料与充足的文本载体,故而史料的丰富性略显不足。当代史料源信息骤增,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领域内,除却传统史学范式下生产的物质形态史料,非物质形态史料也以难以想象的速度产生着,不断丰富着史料内容。伴随着信息处理手段的不断提高和存储方式的多样,新技术能够帮助历史工作者快速记录、分类与保存那些能够反映社会各个层面实况的非物质形态史料。如中国国家图书馆立足口传档案库建设,依靠海量存储设施开展运维与服务,突破了传统媒介对非物质形态史料的存储限制,将大量口头传统主题、专题等内容,通过数据分类与规范后纳入其中,建成了完备的查询检索体系。

二是可重现信息的内在关联。非物质形态史料借助信息化技术,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之优势,优化算法,整合分散信息,呈现信息的内在关联逻辑,挖掘更为接近的历史真相,使“依靠数据库发现知识”成为可能。传统物质形态史料因客观条件制约,存放较为分散,官方与民间的双向传递皆受到限制,且流动性较低,难以形成史料间的关联性研究。非物质形态史料借助大数据技术,不但能够有效解决信息之间无法互联互通的问题,还可以通过史料自动对比、关联信息生成、研究趋势预测等方式,为研究者提供更为直观和准确的研究素材。历史学家如能持续突破学科限制与认知局限,以重实效、重实证的现代哲学理念为指导,建立起内在关联、逻辑互动的史料数据库,将极大地推动史学研究向前发展。如在具体研究工作中,历史学家可以借助知识图谱理念“展现了人物之间丰富的亲属及社会关系,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并可通过设置推理规则来实现人物之间隐性关系的挖掘与呈现”^{[20](P34)}。

三是类型趋向多元性。传统物质形态史料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以文本为中心的生成方式,都较为单一。非物质形态史料则突破了文本限制,摆脱了媒介对于信息传递方式的限制,将原本难以记录的历史信息借助多媒体技术,以音频、视频等多种方式予以存储,从而达到历史再现的目的。例如,不少民族学、人类学工作者深入田野,借助信息化技术进行大范围、多层次的访谈工作,在相关数据基础之上,建立具有当地特色的族群记忆库。他们利用大数据与量化研究方式,发

掘史料背后潜在的共同历史记忆,为群体在某一时期特定的历史行为寻找合理的解释。

四、非物质形态史料的整理与存留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产生,不仅意味着能够为历史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的研究材料,使历史学家能够以更为广阔的视角审视人类命运,也意味着新史学理念的产生。准确把握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规律,以规范、科学、严谨的态度面对整理、存留过程中出现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有助于此项工作规范化、持续性开展。

(一)整理与存留体系建构的理念

非物质形态史料的引入,代表着新的史学研究态度,是将传统历史研究中“自上而下”的官方视角,转为“自下而上”的大众视角,将传统社会垄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资料生成、整理、存留权利还于大众。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人人都是历史进程的记录者,这不仅是话语权的转变,也是现代社会民主精神的再现。因而,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在选取对象时,有别于传统史料的甄选过程,开始更多地将注意力聚焦于独立个体与微观世界所创造的材料。熊月之认为,新型史料的整理与存留模式“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6](15)}。以《宫女谈往录》为例,研究者认为外界只能依据官方记录看到故宫的“外壳儿”,而无法触摸到故宫的精神内核,并由此造成认知隔阂。因此,只有当历史学家将视野从宏观叙事转向参与历史活动的个体,承认社会大众所完成的历史叙述,并将其纳入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中,完整的时代精神才会跃然纸上。

非物质形态史料在整理与存留途径上,强调借助交叉学科研究范式,以数据库建设为中心,注重整体观照和方法创新;在整理与存留内容上,关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历史资料,主张将原先被忽视的个人记忆重新带上历史舞台,通过大数据等信息化方式予以整理,将琐碎史料以整体的观念进行描述和阐释,从而确保分析结果的客观性与全面性,即“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21](P104-105)}。可以说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的产生,为促成史学研究方式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

促成知识发现的多样性,是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建构的目标之一。以非物质形态史料为主的资源数据库,在知识发现过程中不再囿于单纯文献资料的聚集整合,而是以细化档案资源为目的,积极介入知识领域内多层面的分析与处理,即基于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特点的知识发现体系,促成知识收集、处理、传播过程的加速。当前国内档案馆藏机构,虽已逐步拓宽馆藏种类,积极纳入非物质形态史料,但由于收集主体、收集方式、馆藏方式的差异,诸多资料的整理、留存工作仍呈现出一种较为粗放的状态。因此,在完善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的同时,重新梳理档案资源知识发现体系结构,完成已有数据的清理、筛选、重组、关联、聚合过程,使原本零散、独立的数据产生互动与整合,实现知识的流动与增值,具有重要意义。

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是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建构的又一特征。古代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路径多有常例,是具有政治性质的官方行为,然伴随朝代更替,相关政策的延续性中断,导致大量珍贵史料散失。近现代以来,史料整理与存留已不单是政府工作,许多高校、研究机构亦参与其中,并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作制度。当代史料的整理与存留工作被置于重要

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集中出版了一批优秀成果。不足之处在于,各级档案部门所处地区存在差异,技术保障、资金支持等都不尽相同,导致对中央宏观统筹规划落实不足,不少地区史料整理与存留制度建设滞后,史料利用率较低,不能高质量服务社会发展需求。故而,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工作,始终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以期通过统一、规范、严谨、可行的制度建设,为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工作提供指导,使其有章可循、有据可依,避免各自为政、标准不一。

(二)整理与存留体系建构的特性

非物质形态史料研究诞生于现当代历史研究转型期内,作为“以往不被关注的生活史、人生史、学艺史、生命情感经历等各类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composite history)’”^[22],是“动态的、相对的社会记忆”保存和流传^{[11](P6)}。相较于传统叙事中以“静态的、绝对的、单一的”方式生成的史料,其在整理与存留过程中具有独特性。

一是模式的独特性。媒介外部形态差异,导致史料整理与存留模式的迥异。传统物质形态史料的媒介形态单一,并因其稀缺性导致记录者多为社会精英,视角带有本阶级特征。当代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民众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各类型材料,多被排除在整理、存留范围之外。而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存留体系能借助媒介外部形态的丰富性,以数据库建设为依托,将更广泛的内容纳入其中。如已有历史研究者将即时性聊天工具、微博、论坛、短视频等平台中出现的各类信息作为史料加以保存,并在整理、归纳之后,借助信息化硬件进行存留,实现对社会细微方面记录的目的。

二是内涵的独特性。丰富的媒介外部形态赋予当代历史学者更多的书写权利,使其在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过程中,比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具有更高的自主度。如毕摩因对彝文的创制、发展、传播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彝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毕摩拥有知识的权威性,天经地义地成为了向彝族人民解释生产生活现象和自然天文现象的‘专家’”^{[23](P114)}。这使得历代毕摩所整理、存留的文献材料,必然与自身职业、价值观念和社会地位相符。然此种以毕摩为唯一主体的史料整理、存留活动,在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过程中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多元化的媒介必然导致叙述权利的分散,避免了单一历史记录者对此过程的完全垄断。

三是内容的独特性。非物质形态史料形式多样,内容可以是网络对话、场景视频、口述历史、艺术展演、数字新闻等人类社会活动中产生的一切数据。相对于物质形态史料的整理与存留专注于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体系所接纳的内容更为繁杂,主张将一切能够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实景、透露出特定空间内人群共同情感和集体记忆的资料纳入其中。如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于2014年起开展“家·春秋”口述历史影像记录项目,鼓励年轻人借助数字影像媒介,将关注点回归自身,把镜头对准家人、家族和故乡,主动突破代际隔阂,聆听父辈讲述重要历史时期的亲身经历,以自身行动参与到历史叙述中去,记录社会发展历程中普通民众的“家族记忆”。

四是路径的独特性。面对现当代社会难以计数的信息资源,媒介质量决定了全面记录各类信息的可能性。与传统史料整理与存留重于文本书写不同,非物质形态史料所倚重的媒介在存储类型、存储量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能在文本之外采用音频、视频等形式完成信息采集、整理及存留。如在社会调查工作中,研究人员便时常利用新媒介对研究内容予以记录,并按照行业通行标准和规范进行分类编目、保存。并将这些具有非物质形态特征的史料转为数字形式后,按照数字化存储标准将其录入数据库,实现了对研究对象的数字化管理。

(三)整理与存留体系建构的实践路径

历史资料作为文献信息的一种,“必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动力,这就是文献传播的动力机制。通过文

献传播,文献传播者和受传者实现了信息交流,各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产生了一定的效益”^{[24](P20)}。同样,它的生成与传播需要满足信息生成、信息记录、信息交流三个步骤,达成“人/在场——信息/被记录——人/复原”之间的互动。因此史料的整理与存留成效则决定了此后史料交流/分析的深度和广度。

传统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采用二维模式,整理与存留的路径多为重点事件→文献→馆藏,把记录社会事实的需求转化为特定范围的社会实践。非物质形态史料则自身不具备物质性外壳,生成过程需借助物质性媒介,整理与存留路径为资料收集(非物质形态)→资料整理与记录(物质形态)→资料分析→资料数据化管理(非物质形态以物质形态呈现)。依托信息化数据库,非物质形态史料在整理、留存过程中能够以机器学习算法完成外部联系构建和内在意义挖掘,探寻多重文本后的历史相似性。以同类型史料的知识发现过程为例,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以关联规则分析为主,比较适合显而易见的知识发现。信息化背景下的史料研究,则借助知识图谱生成等做到了深层次处理,不仅可以完成较为复杂的知识关联探索,还能够依据自身技术优势,提供合理的知识挖掘方案。此种范式实现了以往研究所不能触及的知识推理、逻辑验证、路径设计等环节,有效拓宽了数据研究边界,简化了知识关系网络,深化了史料资源内涵,达到挖掘隐性知识,丰富史学研究方法体系的目标。

在此过程中,历史工作者需注意两个问题。一是非物质形态史料内容极其庞杂,更新频率极高,如何选择恰当、具有代表性的材料纳入研究体系至为重要。当前不少历史工作者在整理与存留过程中,试图事无巨细地将一切非物质形态史料纳入其中,缺少前瞻性的筛选,导致大量无效数据产生。二是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否准确。非物质形态史料具有一定特殊性,在研究方法选择上要有针对性,避免出现刻板使用已有研究范式的情况。特别是国外不少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范式,有其历史背景和地域特色,不能不加辨别地套用,以免研究结果与历史事实之间出现差异。

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采用三维模式,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实物资产与知识资产之间存在的错综复杂关系,呈现知识资产在信息空间中独特的运动规律。对此,马克斯·博伊索特(Max Boisot)展示的I-Space(Information Space)模型,即“ECU空间模型”,作为概念性工具和分析框架,很好地阐释了信息生产和流动问题。它由编码、抽象、扩散三维坐标,认识空间、效用空间、文化空间构成^[25],从纬度组合与三维空间构建方面,为非物质形态史料整理与存留研究提供认知角度,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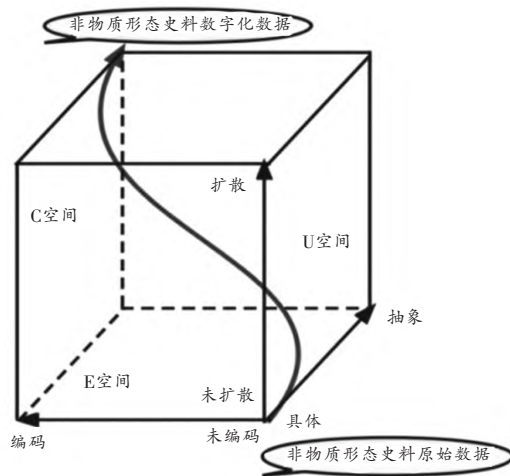


图1 非物质形态史料ECU空间模型

编码过程是通过数字化采集将非物质形态史料中未编码的数据记录为数字形式数据;抽象过程是对编码过程形成的数字形式的、具体且分散的非物质形态史料数据进行提取概括,并分类存储在数据库中;扩散过程则是将存储的数据传播分享给受众。E空间(Epistemological Space)即认识论空间,反映了采集与保存环节中采集、组织史料数据为感知类别,并对其进行归纳和概念化存储的结构化方式,构成了精简数据处理过程的联合认知策略;U空间(Utility Space)即效用空间,反映采集和保存环节与后续应用环节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数据库中史料信息的抽象程度、类型分布和质量、效用之间的关系;C空间(Culture Space)即文化空间,反映不同史料信息在特定受众中的传播和共享方式。^[25]

非物质形态史料数字化生成、整理与存留所采取的技术体系,包含数字化资料的采集、存储、管理、传播等全过程。以数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例,对已采集的数字化资料,分为图像、音频、视频、三维模型等不同类型加以归类保存,并依据资料核心要点进行二次分类,形成层级鲜明的保存体系。随着技术推动,传统的二维静态数据也正在向三维动态数据演化,形成新的数据生态系统,为连接两种不同形态史料信息,形成互补互证提供了可能性。数据库建设作为非物质形态史料数字化存留过程中至为关键的一环,研究者应遵循原态性、共享性、安全性、完整性等原则,实现物理层、逻辑层、应用层三个层面的和合共生,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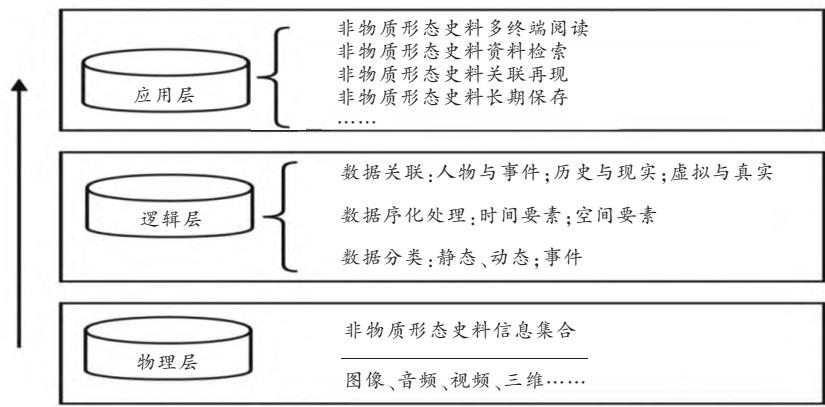


图2 非物质形态史料数字化整理与留存技术体系

可以看出,非物质形态史料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重大事件叙述,而是关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社会成员共同创造的一切精神、行为、语言产品,包含历史亲历者的回忆、社会突发事件的记录等。在整理过程中,研究者注意到,在同一社会结构中,由于经济、文化地位差异,精英阶层价值取向与草根阶层发声需求不可避免地形成“知沟(knowledge gap)”现象,话语权差距逐渐扩大。^{[9](P171)}因此,历史学工作者在史料整理过程中,须尽可能地将丰富的非物质形态史料置于外部环境影响较小的静态空间环境之中,对史料结构和符号体系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进而在明悉史学研究的共时层次之后,将其妥善归类与存留。

当前,非物质形态史料数字化采集、整理与留存体系建设已初具成效,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由此得以保存与传播。如藏族史诗《格萨尔》,是集音乐、文学、表演为一体的“说唱”表达形式,为传统藏族社会文化口头传承的集大成者。但随着《格萨尔》存在环境日渐萎缩,说唱艺人群体也出现了“人在艺在、人走艺绝”的局面。对此,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抢救保护工作,借助录音、录像等方式,从尚活跃在民间的140多位艺人口中抢救出百余部史诗。^{[26](P26-28)}此外,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还结合数字化保护措施,完成了格萨尔说唱艺术资料、格萨尔说唱艺人、格萨尔数据库建设与格萨尔文化数字化网站的建构与传播。^{[27](P24-27)}可见依靠信息化技术手段将口述资料转为视频、音频、文本存在的方式,能够全面展示研究客体内容的丰富性,也便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

资料采集是将非物质形态史料转化为物质形态存在的必要环节,也是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的开端。在此阶段之后,研究者须依据研究规范,使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整理与分析,并将其置于特定的数据库中予以分类存留。至此,历史工作者方完成非物质形态史料生产的全过程,如图3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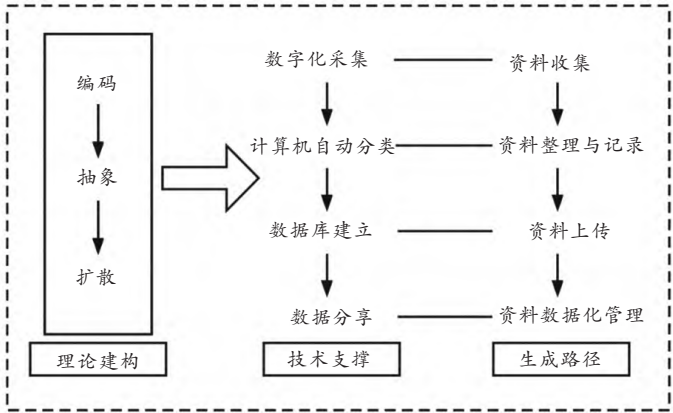


图3 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留存路径矩阵模型

五、结 语

作为具有即时性和广泛性的史料,非物质形态史料几乎涵盖了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技术变革背后多为思想驱动,将非物质形态史料纳入史料存留体系,本质为人的社会需求与物的技术发展之间所产生的耦合。此种互嵌上升式关系,既是内容层面的,也是价值层面的。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研究工作的深化,是当代史学新发展的体现,也是历史学家对于史料客观性、整体性的观照。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体系的科学建构,将更进一步推动其规范化、特色化发展。

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体系能把过去的历史事实中动态的、私有的社会记忆变成静态的、集体的社会记忆,形成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追溯。也能把正在进行的历史事件中即时的、细微的社会动态变成立体的、全面的情景复现,形成历程上和过程上的映射。通过规范政策、制度,细化分类、管理流程,强化数据库运行基础,进而完成史料外部联系构建和内在意义挖掘,能够推动非物质形态史料生成、整理与存留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Charmaine C.Williams.Critical Oral History: Reflections on Method and Medium.Qualitative Social Work, 2019,18,(5).
[3]Almila Akdag Salah, A. A. Salah, Heysem Kaya, Metehan Doyran, Evrim Kavcar.The Sound of

Silence: Breathing Analysis for Finding Traces of Trauma and Depression in Oral History Archives. Literary & Linguistic Computing, 2021, 36, (Oct. Suppl.2).

[4] Iain Walker, Martin Harvey. *On designing an oral history search system*.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2017, 73, (6).

[5] Francisca Pessanha, Almila A. Salah. *A Computational Look at Oral History Archives*. ACM Journal on Computing and Cultural Heritage, 2022, 15, (1/2).

[6] 熊月之. 口述史的价值[J]. 史林, 2000, (3).

[7] 王明珂. 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 历史研究, 2001, (5).

[8] 傅光明. 口述史: 历史、价值与方法[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 (1).

[9] 王拓. 口述史: “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2).

[10] 李小沧. 现代口述史对传统历史学的突破与拓展[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

[11] 王景高. 口述历史与口述档案[J]. 档案学研究, 2008, (2).

[12] 杨立. 信息化时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数字化抢救性保护探析[J]. 文化艺术研究, 2017, (2).

[13] 周琼. “创造”与书写: 环境口述史料生成路径探微[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 (1).

[14] 丁方舟. 论传播的物质性: 一种媒介理论演化的视角[J]. 新闻界, 2019, (1).

[15] (美) 约翰·费斯克. 传播研究导论: 过程与符号[M]. 许静,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6] 周晨. 国际数字人文研究特征与知识结构[J]. 图书馆论坛, 2017, (4).

[17] 郭金龙, 许鑫. 数字人文中的文本挖掘研究[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12, (3).

[18] 杨茜茜. 数字人文视野下的历史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路径探析——兼论档案管理中的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思想[J]. 档案学通讯, 2019, (2).

[19] 袁星洁, 季凯华. 隐忧、策略与螺旋式演进: 语境崩溃情境下聊天截图的传播实践[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4).

[20] 陈涛, 刘炜, 等. 知识图谱在数字人文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19, (6).

[21] 陈支平. 历史学的困惑[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22] P. R. Thompson.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3] 杨兆云, 单江秀. 论彝族毕摩的角色[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24] 朱从兵. “文献传播与历史研究”小议[J]. 安徽史学, 2019, (1).

[25] (英) 马克斯·布瓦索. 信息空间: 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M]. 王寅通,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

[26] 王金芳(措吉). 西藏《格萨尔》史诗说唱艺人传承与保护研究[M].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23.

[27] 颜亮, 蔡秀清.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格萨尔说唱艺术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路径[J]. 集宁师范学院学报, 2019, (5).

【责任编辑: 王立霞】

ABSTRACTS

(1) The Generation, Colla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Intang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Yang Hongwei, Li Wenp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as the medium that carries historical information, exist in both tangible and intangible form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ang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cus more on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embedded in those micro-level social changes. Unlike traditional materials that required professional handling, intangible historical records are now generated by a broad array of participants, leading to a diversity in recording subjects, content, and formats. Taking database construction as a key node in the process of collation and preservation, intangible historical materials actively involve themselves in multi-level analysis and processing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so that the originally scattered and independent data can interact and integrate into data units and thus, pumping the flow of knowledge and its increase in value. This bottom-up approach to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not only alters the conventional sequence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but also embodies a new historiographical perspective and attitude.

(2) An Inquiry into the Concept of “Medicine and the Yijing Share the Same Origin”

Liu Changlin

The phrase “Medicine and the Yijing Share the Same Origin” (yi yi tong yuan, 医易同原) refers to the shared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the *Yijing* (*Book of Changes*), grounded in the doctrines of primordial qi (yuanqi, 元气) and the Dao of Yin and Yang. Both TCM and this philosophical concept employ imagistic thinking (yixiang siwei, 意象思维), characterized by “understanding the small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great” (yi da guan xiao, 以大观小).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deeply intertwined—so much so that one could argue this shared philosophy constitutes the inseparable theoretical core of TCM. As the saying goes, “Without knowledge of the *Yijing*, one cannot speak of superior medicine” (bu zhi yi, buzhi yi yan taiyi; 不知易, 不足以言太医). On this basis, we can,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distinctions and boundari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revealing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fundamentally incommensurable and cannot be integrated into a single academic syst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cine and the *Yijing* is reciprocal: to “know the *Yijing*” is essential to “speak of medicine”. At the same time, one must also recognize that only through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s it possible to comprehensively and accurately grasp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hilosophy as a whole.

(3) Shap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 Adap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Qiao Xiaonan, Ma Feiyue and Wang Yi

The essence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to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is a new type of productive forces formed by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workers, labor materials, labor objects and their combinations.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s still to realize the enhancement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and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lso put forward